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09年 3期

要 目

- | | |
|------|----------------------|
| 月度论坛 | CCG:完善“千人计划”的建言献策 |
| 国际问题 | 丁 果:中国不应继续一厢情愿式睦邻政策 |
| 深化改革 | 薛 澜:别让干部“减副”重陷怪圈 |
| | 王辉耀:独立性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 |
| 和谐社会 | 钱 宏:中国的教育、三农以及官本位的问题 |
| 经济转型 | 陈志武: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
| 科研改革 | 郑永年:有关中国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
| 就业问题 | 汤敏、俞建拖:推广电子商务帮助大学生就业 |
| 人才竞争 | 饶 毅:改变中国科研环境需真正重视人才 |
| 刺激内需 | 黄亚生:家电下乡不如藏富于民 |

www.ccg.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科技园D座G层(100102) 电话:010—64392122 邮箱:ccg@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09年3期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总编

王辉耀

副主任/ 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志凯 汤敏 陶庆华 田溯宁

王波明 薛澜

执行编辑

邓宗南 常慧敏

编务

封涛 袁安妮 石月 史慧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兴动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邓峰 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宁 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首代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山 三山公司合伙人

李小加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中国区主席

李一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林达贤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刘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刘松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沈冲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

宋永华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管理司司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谭天星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司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主席,创办人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夏颖琦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亚大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晔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姚望 博鳌亚洲论坛总监、亚洲教育论坛秘书长

易珉 GE公司环渤海区总经理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张亚勤 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民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月度论坛

完善“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的建言献策

2009年7月12日,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于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了有关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建言献策座谈会。欧美同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韩启德,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傅志寰,欧美同学会秘书长靳志伟,国资委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执行会长刘延宁,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沈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江力平,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处长张栋,中央统战部六局处长王娅妹等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主持,并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留学人员代表、“千人计划”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包括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王小凡,中国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王文生,北极光风投基金资深合伙人邓锋,机工华章出版社社长孙立哲,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宋永华,美国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恩,北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张东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主任陈松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晓亚,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施一公,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段燕文,北京大学生命学院院长饶毅,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北京市侨联副主席陶庆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詹启敏,上海同济大学校长裴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等。

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代表高度评价了“千人计划”,认为这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重要举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竞争的积极对策。为进一步完善“千人计划”,以帮助国家更好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与会者还积极献智献策,提出了完善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一、应坚持高规格、高定位、高标准

“千人计划”的定位要清晰,引进人才要坚持高标准,国家不可能把所有人才都用一个计划来引进,所以“千人计划”应做成一个高规格的精品项目:其一,学术上引进的人才应全职回国,六个月标准太低,兼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国工作,特殊情况下可另行处理,但整体标准不能放低;其二,必须是高端人才,例如研究型人才必须是一流研究性大学的终身教授,创业型人才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并有海外创业经验或国际知名企业高层管理经验;第三,水平必须在本领域国际领先;第四,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特点不同,应注意分类管理,创业型人才不一定非要呆在国内六个月以上,重要的是资金、项目等搬回了国内。另外,两千名申请名额应是上限,关键是保证人才质量,宁缺毋滥,名额也不能平均分配,应根据国家需要以及申请人才的质量来分配名额。

二、应与明确需求、严格审核、长期跟踪相结合

引进人才不但要高标准,而且要与明确需求、严格审核、长期跟踪相结合,避免引进不合适的人才。首先,人才引进与政策、经费、项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因此政府应尽快向社会发布重大专项岗位需求目录,方便用人单位以及人才有针对性地进行申报。其次,人才审核一定要严格,一是评选委员会质量要高,必须是本领域有责任心的专家;二是要考虑公开公示,实施阳光政策,接受社会的监督;三是如果发现弄虚作假,对个人和单位一定要有问责。当然,严格审核不意味着要行政程序烦杂、拖沓,许多不必要手续可以简化,例如学位认证可以改为自愿申请,能分辨学位真假的单位可以不走这个过程。最后,要有事后长期跟踪,既是对引进人才进行长期服务,也是进行监督,“千人计划”的荣誉可以终身,但人才不再发挥作用或不再参加具体工作,就应该没有经费,避免利用“千人计划”回国养老。

三、协调好与其他人才以及其他人才引进计划、政策的关系

“千人计划”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其他有关引进、使用人才的文件、计划、政策、规定,例如长江学者计划;此外,即使“千人计划”本身,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甚至各用人单位都可能各有所不同的具体政策。因此,“千人计划”必须要与以前政策文件形成一致性,跟其他人才计划衔接好,并处理好内部统筹协调的问题,避免造成“互相打架”,合理搭配、层次分明地为国家人才工作服务。另外,为避免引发海外人才

与本土人才，新老引进人才、富有经验的人才与年青人才的矛盾，政府应适当考虑降低标准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青年杰出人才的计划，以及出台政策解决追溯以往的问题，过去多年来回国并从事具体工作的海归也应能申报“千人计划”，避免“喜新厌旧”，影响“千人计划”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

四、完善签证入籍、子女教育、工作支持等人才配套服务工作

人才不能仅靠高薪来吸引，必须完善人才配套服务工作，才能真正对人才具有吸引力：其一，要解决资金配套、项目支持、研究服务等工作配套服务，引进人才却不为人才进行具体工作、发挥才能配套，政府的投入就可能无法收到回报或贡献，而人才本身也需要有能够发挥才能的平台才愿意长期留下，因此，解决工作配套服务问题是政府以及人才双赢的关键。

其二，还必须要解决签证、入籍、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问题，引进人才全职回来工作，他们及家属的户籍和签证怎么解决？子女教育怎么办？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所谓“高待遇”根本吸引不了人才。例如国内国际学校一年学费要几十万，北京、上海房价非常高，政府一百万配套资金甚至只够几年学费，也很难买到像样房子，而这些人在国外已经是终身教授等职位，有很高收入，子女教育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愿意回来。再如很多跨国企业高管都拿不到多年往返签证，稍微不注意签证过期就每天罚五百元，工资还不够交罚金。事实上，例如护照签证问题，欧美国家之所以不担忧，是因为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完全可以给中国出生的留学生以及华人发免签证的“同胞证”，这是不花一分钱就能促进人才回归以及增加消费的好政策。

五、与完善人才机制以及整体环境土壤相结合

人才与环境、土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中国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以及整体环境、氛围、土壤不改变，引进人才就很难发挥最大作用，以及促进本土自主培养人才能力的提高。与引进一个人或一个团队、完成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发表几篇论文相比，如果能通过引进人才改善中国整体的环境、土壤以及培养人才的能力，“千人计划”就能做出更长远的贡献。同时，为了发挥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改变“土壤”的作用，政府应考虑让这些人才成为各种评估的评委以及更多的“参政议政”，例如可在全国政协等专门设立一个海外人才或留学人员的界别，充分发挥留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智力密集型优势，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六、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不能重自然科学而轻人文科学

“千人计划”目前引进的人才更多偏向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创业领域，但我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软实力更为急缺，在人文社科、公共管理、政策研究等相关领域更需要大批高层次人才，政府的外交领域、外经贸领域、侨务领域、新闻领域、政策研究领域等也都非常需要一大批跟国外联系广泛的国际人才来发挥作用。现在政府内部缺少这类人才，很大问题上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海外有这样一批熟悉西方、善于跟西方打交道的人才，却没有很好的渠道为国服务。因此，“千人计划”应该把公共管理、新闻传播、政策研究等人文科学领域的人才也作为引进对象。

◆ 国际问题

中国不应再继续一厢情愿式睦邻政策

加拿大时事评论家 丁果

朝鲜进行核试验，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中国也前所未有的谴责。但是，一旦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全面制裁朝鲜，中国仍然反对。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被金正日当成予取予求的“保护伞”，中国这是在养虎为患，这也给中国迄今为止的“睦邻政策”敲响了警钟，到了不要再一厢情愿寻求和睦的时候。

过去，新中国建立，遭遇西方围堵，尽管与苏联有短期结盟，但中国支持“万隆会议”，支持不结盟政策，期待冲出包围圈；之后，与美国对着干，支持北越，支持北朝鲜，支持红色高棉，支持缅共，这是两个阵营的抗争。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国际共产主义”的传统思维，专注国内建设，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采取了更为柔软的“睦邻政策”，以免让周边国家不要陷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里面。这些阶段性的睦邻政策，或者说东亚、东北亚、东南亚政策，整体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有一个与北京对抗的美国，有一个台湾独立的隐患。

但是，如今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在经历了国内的巨变之后，尤其金融危机的打击，可能被迫将从一强独霸的地位上退下来，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美国已经无力围堵中国，反而更希望中国能够与美国合作，扮演维持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和平的伙伴角色。

相反，倒是中国的周边邻国，利用中国所谓的“睦邻政策”，利用中国与美国的矛盾，不断叫板，争取中国的让步，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咄咄逼人，朝鲜名目张胆“讹诈”，日本在钓鱼岛的“主权宣示”升级以及在东海油田开发上进逼，缅甸只要求援助不听合理劝告……等等，都是证明。当然，目前最直接的危险是朝鲜在核试验上一意孤行，这样下去，南韩和日本将可能说服美国让他们也拥有核武与朝鲜对抗，长此下去，不到五年十年，中国周边国家将都是核国家，从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到东亚的日本，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诸国。这种状况，对美国的威胁当然大，但对中国则是致命的威胁，因为中国将生活在火药库里，被迫进行核扩张。而且小国拥有核武，爆发核战的机会远远超出大国。

因此，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不能再沉浸在“不干涉”主义的幻想中，而是要修正改变传统的睦邻政策，不要一厢情愿地寻求周边和睦。睦邻不等于坐视危机不顾，而是要合理“干涉”，当然同时也可以“干涉”的同时，保证邻国不受大国的“入侵”。总之，这可能就难免需要与美国合作，与欧盟合作，与俄罗斯合作，大国的抗争有可能转变成大国的携手，共同来管理区域纠纷，保证地区的和平发展，但这样修正政策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海外利益。

◆ 深化改革

别让干部“减副”重陷怪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今年，吉林省已经免去了6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这个不同寻常

的举动在全国掀起了阵阵“波澜”。看待其中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吉林省是第一个响应今年1月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的省份，更重要的是这次精简官员背后，不仅是官员数量的变化，也与干部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深层次关联。

“减副”，首要的目标当然是要精简官员数量。如今，我国不少地方政府职数过多过滥、人员臃肿的现象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媒体曝光的河南省新乡市、辽宁铁岭市、湖南平江县副职和助理扎堆的问题，也不过是地方政府人员超编现象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吉林省政府的“减副”行动，自然会得到广泛的称赞。但是，叫好之余也要冷静思考，我们这次“减副”如何避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官员职位的设立是否坚持了“以事设人、以岗定责、以职授权”的原则？如果光减官员不减事情，剩下的官员更忙，可能事情就会变得更糟。所以，干部职数的增减必须要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形成这样怪圈的逻辑在于政府官员的数量与政府的职能密切相关。如果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简单削减政府官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公共治理的理论告诉我们，官员人数多寡不是衡量政府优劣的标志，关键是政府是否承担了处理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这些必要之责。同时，也在于政府是否从那些传统计划经济下对经济事务的不当干预和限制中退出来。围绕政府责任的实现，官员数量变化才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合适的。

同时，如何建立一个内生的政府膨胀的有效约束机制也是让人关心的问题。这次“减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央高层自上而下的政令和权威来实现。应该看到，仅仅靠这样的“外力”来解决政府机关的臃肿还远远不够。首先，上级领导机关毕竟很难时时刻刻地保持对各级政府的严格监督，只要干部职数扩张的内在动力存在，各级地方政府就会有各种招数来增加干部职数：从副主任、副县长、副市长，到主任助理、县长助理及市长助理等等，不一而足。其次，各级各地政府工作情况千差万别，完全规定得死死的也有其不合理的方面。

因此，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内生约束机制来抑制地方政府机构的扩张动力。例如改革政府预算机制，加强人大和社会对地方政府的

行政预算的监督和审批，让更多的公众和人大代表能够真正履行“代表”的职责，严格审查、监督干部。国外很多地方政府的市长都是兼职的，其原因就是当地百姓明白官员的工资是要从纳税人交的真金白银中提取，官员越多，缴税越多。所以，很多国外小城市的议会宁可批准设立全职警察，也不批准设立全职的市长。

此外，我们还必须改变中国“官本位”的不良社会风气。在我国，各级政府过多设立“助理”、“副秘书长”等职位，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密切相关。法律与政令往往依靠的不是其自身的权威，而是依靠执行人官阶职位的大小。这次“减副”举动展开后，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就抱怨，如果他们没戴上一个什么“副秘书长”或“市长助理”之类的官衔，他们的工作就很难得到基层单位的配合。法律、法规、政策往往不如领导的讲话和暗示好用。如果这样的社会风气和行政文化不改革，“减副”的真正目标也还是难以达到。

独立性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

中国与全球化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智库(ThinkTank)是以专业从事决策与政策研究、咨询、建议的新兴非营利机构，在现代社会对推动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公共政策完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某些舆论甚至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

但在中国，尽管有媒体估计中国各类智库已达到2000家，数量甚至超过美国，但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以及国际上表现出真正的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还不成熟，至少在民间性、独立性、国际化三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古代“军师”、“幕僚”等名词产生开始，几千年以来，中国并

不缺乏官办的东方式“智库”以及为个人包括帝王服务的“智囊团”。但是，有公共性质的现代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的智库是一种存在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的公共智囊团，这种公共性也可以解释为民间性，因为他们研究的政策真正的承受对象是民间的企业和个人，所以也就强调智库服务政府却不能是政策与规划直接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说避免成为利益相关者，而智库专家一旦通过“旋转门”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和执行者，身份也会从学者变成官员。

中国目前也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大学附属型智库。由于官办智库的特点，例如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等，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的职能思维要在实际行动中从“父母官”转变到“公仆”，就有必要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制，而智库作为社会各行各业中惟一专业的公共的政策研究者，如果缺乏民间性以及第三方的公共沟通性，就很可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民意就会在政策制定中被疏漏。

当然，智库不能只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也意味着要保持独立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首先，智库要自身具备相应的“智慧之士”以及职业精神，能完成独立的研究。其次，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有稳定和多元的收入，避免被赞助者“绑架”成为“利益代言人”，同时尽量让研究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例如管理制度上可把研究、筹资、经营等分开。最后，还必须有让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并不完善。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真实，甚至干脆得不到这些数据，自然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民间智库可以让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借助更多社会智力资源，按理应该要鼓励其发展，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尽管是众

所皆知的非营利组织，却必须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形式注册。三是中国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当然，这一问题对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来说也一样存在。

另外，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也很缺乏。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当中、并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然而，且不谈像美国的智库那样来到中国本土发展以及展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即使在朝核六方会谈这样与中国有关，以及提议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这样由中国政府发起的重大话题当中，中国的智库都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这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国要大国崛起，要输出软实力，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

◆ 和谐社会

中国的教育、三农以及官本位的问题

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 钱宏

不管外国人如何描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成就与价值，也不管那些林林总总的描述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但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实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这里也姑且笼统地称之为“中国模式”。

此共识的形成可分为既有内在承接，又有新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一，1950-1977年，以斗争为主线，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可称“苏联模式”；二，1978-1989年，以经济建设为主线，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市场主导应运而生，形成如承包、特区、双轨制、分税制、产权制、股份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为标志的对象改革，激发出空前的社会活力，可称“中国经验”；三，1990-2008年，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党、政主导“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稳定压倒一切”，方式是以GDP为奋斗目标，以“比较优势理论”（林毅

夫)和“非民粹主义”(樊钢)为导向的基建型城市化和外贸型制造业为发展方式,可称“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总体效果是,在短短30年内完成了欧美国家花200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商文明以及硬件建设等方方面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在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以及对我国最大基数和底层群体(农民、传统工人、农民工和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的劳动盘剥和生存挤压。

这当然不是政府推行这类经济模式的目的,但由于目前社会与公民参政、舆论监督的渠道不畅,因此就为压缩社会空间、扩大“政府公权”,以及权力寻租等“公权私用”行为留有了充分余地。如今,人们不能不大声询问:中国的“改革共识”还存在吗?我想,改革共识依然存在且强劲,只是作为着眼于“比较优势”的改革已然缺乏内在动力。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以及完成和谐社会之路,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主要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

因此,中国确实需要重新寻找普遍动力,形成路径共识。客观评估90年代以来的“中国模式”,并从中汲取教训,以及回顾反思80年代的“中国经验”,最终恢复改革的内在活力。而着眼于新世纪新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制度性、整体性改革,将是重新获得社会改革共识和动力的基础。我想,这首先需要从三个基本问题入手加以解决:一是广义教育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官员问题。

中国的教育问题,其核心是“人格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保有国民创造性的问题。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传术不传道”,为了满足出人头地的原始欲望,而忽视了健全人格的培养,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缺德教育”。所以,邓小平在世时就说过“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人格的核心,是人自身的德性,是人对于天下苍生的关怀。人格与国格直接相关,人格教育不健全,国家形象也就无从树立。没有人文教育,也难以满足发展知识服务业的全面人才需求。

中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与乡村生活的问题。与农民最密切的当然是“土地问题”,过去多年来就已经有了以人民公社和城市单位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人民公社的形式在30年前废除了,但“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却几乎以完全牺牲乡村生活与乡村败落为代价,以更加稳定的模式被继续加以强化。从国家战

略的意义上看，粮食是永恒的可再生战略资源，所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永保种子的天然自组织力和农民的社会自组织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和目的。

中国的官员由两个相关环节构成，一是“上层建筑”，一是“官阶官位”。从“上层建筑”角度看，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金字塔垂直管理结构以来，结构始终未发生过本质性变化，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官阶大一统”基础上的一切国家、社团组织行政级别化、待遇化的制度安排，政府机构迅速膨胀到“极限”，导致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文件、口号如何宣传亲民、为民，某些部门与某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奉行的仍会是“官本位”理念。在此理念支配下，文件、制度、法律显得残缺无力，运行的常常又是所谓的“潜规则”。

所以，中国亟需完成三种改变：一是人格更新，明确所有教科文组织的基本职能，旨在形成具有自觉、自立、自由意志的有德性的公民。

二是新土地改革，明确乡村公民的基本权益，尊重乡村公民对于现代化、城市化道路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扶持农民的社会组织成长。

三是官位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官吏分类管理机制》和《逐级党政分开制度》，厘定全国官员总额，严格区分官位官阶性质及名分（如政务官、事务官、执行官、法务官、咨询官、外交官、军事指挥官等等），明确官阶晋级标准，取消一切非政府组织的行政级别，制定“权力赎买政策”底线，还政于社会，还政于民。

重要的还有治理结构改革，我想，应当把现行中央—部门—省市区—市—县—乡镇的垂直分层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撤地、强县、弱乡”，改为“中央—省区—县市三级”自上而下的集中化扁平治理结构。我注意到，近两年政府已经开始在做“撤乡并镇”这种基础性工作。即使仅仅从巩固国家权威的角度看，这也是减少中间环节，克服现行“财政联邦”对中央政令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从长远看，这是一项伟大的新型政权建设工程，最好能通过人大立法（比如《中央—省区—县市三级治理结构法》），以使这项工程不半途而废。

◆ 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产能。产能增加后又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这也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在讨论的话题。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建设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国有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政府也确实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其副作用也很多，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以及人们对幸福的最终追求。或者说，如果大多数国民没有需要，那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市场范围的扩大，尽管中国人消费不了，但中国的产品却可以卖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已经越来越难。所以，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并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在增长，政府开支在增加，民间消费却在下降

我们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1952年，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1978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到了45%，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多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65%上升71%。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也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则下降到10—11%之间。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政府开支则一直保持在GDP的22%水平。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民间消费所占比例都越来越高，而中国恰恰相反。

政府应该还富于民

中国的经济确实在增长，中国的土地以及其他国有资产增值也有这么多，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按照全民所有制的特点，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变成推动经济再发展的消费能力，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通道是封住的。目前的国有财富，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无法支配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所以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我们每天决定花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简单地说，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劳动收入，而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最大的优势之一。因此，经济增长的成果是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与农民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说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低，比美国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政府可以获得不需要通过征税却可能比税收更高的财富。

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在民生项目中投入也更多。例如根据财政部一发言稿，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只占当年GDP的2.4%。可在美国，2007年在同样三项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很显然，国有资产没有那么庞大的美国，在民生投入的比例上都接近中国的5倍。再举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所以，在中国，“二次分配”的理念并没有被数据所支持。中国要完成经济模式的转型，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采取措施还富于民。

◆ 科研改革

有关中国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拨款给各类大学和研究所），直接产生了一系列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很快增加。但是，前不久，我们一些海外专家在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不得不感叹：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也如此之多，都是世界罕见，但可惜大多数却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虽然庞大，但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低。因此，尽管中国一些领域的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总体来说，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如果工业品需要升级，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一样。否则，中国的科研就很有实质性的进步，国家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

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很显然，并不存在着单一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体制类的原因，很多人总会归之于政治体制，其实政治因素很重要，但既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碍来自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而非总体政治制度。

例如研究体制，在种种由官僚或者学术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的压力下，写文章以及发表论文变成了一种政绩，而非一种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而在“写”的过程，由于可能就是为了应付，又往往容易演变成“抄袭”：抄外国学者的，本国学者互相抄的，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无奇不有。很显然，这样写文章、抄文章没有任何附加值。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也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中国用行政来组织学校和科研机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学校和科研组织在中国，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有行政级别。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情况：因为是行政级别，任用校长和所长的最大的考虑就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或者专业水平，而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非非常低或者较低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又进一步阻碍他们录用高水平的教员。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三流的校长”。所以，尽管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但到了具体的单位，对人才依然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这也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吸收到高层次人才一个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响人才的专业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专业精神是一切。但目前一个人所能掌握或分配到的资源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关。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给引进的人才一个行政职务。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因为有了行政级别，人才必须要大量卷入行政事务，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时间，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第二，因为这个行政级别，这个人才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其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没有独立的思考，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得很难。

院士制度也在“寻租”

专业职称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个

很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就是要为知识精英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服务。但在中国院士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中,院士的选举重点不再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会做各种各样的资源动员来争取自己的人被选为院士,甚至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领导。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推荐人才,而是为了和院士关联着的经济利益。

科研经费分配过程中各级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国的科研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结果,大量的经费被投到毫无知识附加值的研究领域,而真正能够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人才得不到所需要的资助。同时,对科研评审和验收也不再重要。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曾经创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两弹一星),而目前尽管中国在知识领域发动一场“全民运动”,即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做研究,但中国和世界在知识领域的差异反而正在拉大。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已经很多年,如果需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对科研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 就业问题

关于推广电子商务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建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汤敏 / 俞建拖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我们建议把推广中小企业与农村的电子商务纳入到大学毕业生见习与村官计划中。这不但有可能解决几十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还能利用电子商务这种新商业模式来加快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农村建设。

一、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与农村中大有可为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上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期，广大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举步维艰，这些企业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行业、技术和市场信息，革新营销模式以降低成本。而电子商务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简化的贸易流程、超越时空限制的经营方式，成为中小企业追逐的热点。电子商务也已经超越了企业开个网页来推销产品的简单模式，目前已经发展到产品管理、供应资源管理、帐务管理、统计分析、在线客户服务等新领域。阿里巴巴、百度、敦煌网等公司的实践证明，电子商务是中小企业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营销模式变革的好途径。自2005年百度从搜索引擎业务拓宽到电子商务领域，目前，接受该公司电子商务服务的企业已近30万家，有超过5000人专门从事客户企业服务工作。

中国也具有成为全球电子商务中心的潜力。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小额产品生产上具有优势，尤其适合电子商务交易。这种优势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事实上，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很快，2008年总体交易规模已达到3万亿人民币。电子商务同样也可以使农村的生产经营与市场进行低成本的对接。通过电子商务，村民可以发布有关本村的产品、资源、劳动力等信息；也可以获得外地的产品需求、招工等等信息。我国99%的行政村已经通了电话，推广电子商务也具备了技术基础。

但是，电子商务在我国中小企业与农村中的潜力目前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我国近500万中小企业中，目前仅有100万多企业接触电子商务。农村商务活动触网比例更少。

二、大学毕业生可以成为推动电子商务的生力军

大学毕业生恰好能弥补这一缺口。大学生掌握较多的互联网技能，具有推广电子商务的天然优势。他们知识层次相对较高，学习能力强，稍加训练就可以胜任小型电子商务的推广业务。这一模式也就能吸收大量的大学生就业。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截2007年6月底，我国仅在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就有460万户，还有3800万户的个体工商户，这些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以每4家还没有触网的中小企业需要一位电子商务服务人员来计算，仅中小企业就有吸纳100万左右的大学生的潜力。如果再把近50万个行政村对电子商务的需求考虑进去，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容量就更大。

三、推广的建议

1. 人员培训

由愿意参与电子商务推广活动的大学毕业生自愿报名，通过招标的方式，由几个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开发出针对不同中小企业与农村生产的电子商务模式，并提供培训，颁发电子商务推广师证书。目前已有一些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正开展与大学机构合作试点，有关部门应密切观察这些试点项目培训与就业的效果，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2.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推广

大学毕业生从事中小电子商务推广可以有不同模式，譬如：其一，由自愿报名参与电子商务推广活动的中小企业挑选经过培训后的大学毕业生，大学生也可以选择企业，做到双向选择；其二，由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聘用经过培训的大学生，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其三，由各地的中小企业局设立一些电子商务推广的公共岗位，招募经过培训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为小企业与微型企业提供服务。

为减少中小企业的风险，加大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可以考虑把推广电子商务纳入现有的大学生见习计划中，并适度扩大参与这一计划的人数。在头三个月，国家给到企业去推广电子商务的大学生提供见习补助。在三个月期满后，企业和毕业生可自主决定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3. 农村电子商务推广

同样，也可以考虑把推广电子商务纳入大学生村官计划中，并适度扩大参与计划的人数。国家提供部分培训经费，并按村官的标准对到农村担任电子商务推广师的大学生给予工资补贴。所在村庄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提供一些开展电子商务的必要投入。

大学生电子商务推广员在农村的职责可包括：建立和维护网站，搜集、整理和发布乡村产品、劳动力、风土人情等信息，利用互联网搜集农产品供求、投资、招工信息等，帮助与培训专业合作社人员熟悉电子商务业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投入是金融危机下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举措提出的。在经济复苏之后，政府可减少财政投入的范围和期限，只针对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村进行补贴。当企业和农村尝到电子商务的甜头之后，他们自己就会承担必要的人力成本。国家逐渐退出这一领域。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这一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可以先在一些地区试点，成功后向全国推广。

◆ 人才竞争

改变中国科研环境需真正重视人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毅

讨论科技教育界人才有三个基本问题：中国需要人才，目的是国家发展、全局利益；中国招聘人才，模式是市场竞争、双向选择；中国选择人才，方法是专家把关、择优录用。先达成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共识，才有助于化解一些其它问题。

中国是一个创业国家，而不是守成国家。创业的国家，需要为国家事业而尽可能获得和支持最好的人才。引进人才也好、支持原有人才也好，首先是事业要求，而不是利益竞争。不仅要目前的条件和环境引进华裔，以后还要有条件吸引全世界不同种族、肤色的优秀人才。只要中国不是退步，而是在发展，就不断会有招聘和引进人才。从社会文化到具体各单位文化，都应该摆脱陈腐的思维，根据历史规律、时代发展，彻底改变中国文化中偏好内斗的习惯，从而联合优势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发展的伟大事业。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其实也是个人才计划——培养人才的计划。他打开国门，允许留学，是利用国外的条件培养人才。这些计划对中国的作用有目共睹。国家近年推出的人才计划，也将对国家发展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只要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能使人才回归后积极地、建设性地为国家尽力，将使这些工作为中国带来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千人计划”也许是国家层面最大规模的招聘计划，以后招聘的常态可能只是各单位自己进行常规录用。国家的计划需要严格把关，既要争取优秀人才，也要防止鱼目混珠。如果第一批单位的“千人计划”真有非常差的人获选，说明评选过程尚需大大改进。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地方和单位为了局部利益与个人联合糊弄国家，不仅应该有机处理有意过失的单位和个人，也要改进评选过程中以便杜绝类似情况发生。选一个很好的人才不容易，允许一定的失败率。但是，不能容忍欺骗性质的问题。

多年来，中国面临主要问题是人才流失。当年有些单位年富力强的入大批出国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虽然人才流失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现在中

国很多人日渐热烈地讨论如何引进人才，这是国家进步的象征。

在全球环境下，中国必须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人才。国家提供大环境和一些条件，使各科研教育机构能够有条件竞争人才。各单位获得这些条件后应该尽量支持最好、最合适的人才，而不是用来分配利益。应聘者选择工作自有不同原因，归属也好、发展也好、祖国也好、个人也好，是具体细节。国家无需过问个人细节，而应该看其所能做出的贡献。

对于单位领导来说，好的领导能招聘和挽留好的人才；差的领导不能得到好的人才，只能看守日渐萎缩的机构。因此，科研教育机构招聘，一定要有好的专家把关，否则体制和条件都不能保证成功。专家要有相当水平能判断人才优劣，而且要有公心、做事负责。一般来说，评选人才要依靠同行专家，而不是中国目前经常出现的跨行业评价。识别人才也是一种才能，判断一个研究是否好，需要懂其内容，判断一个人潜力多大，更需要能力。这些无法化解为数字标准，用所谓“计量”的指标判断，是缘木求鱼。

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环境和条件自然也在变化中。首先，没有哪个单位与人才有父子般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市场规律决定了人人都有来去自由。事实上，即使在国内科教界，自由选择的人才市场也已经成为常规。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后，任何人如果不满所在单位提供的支持，都可以明确提出要求。如果单位愿意、并且有能力挽留，可以支持。如果单位没有条件，或不愿意挽留，个人以脚投票，选择离开，到能给自己支持最大的地方，这是自然之理。

用脚投票，已经也应该是科技教育界的常态。我十几年来观察到，国内主要大学和科学院的研究所，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可以出国。学术好的也不难在国内换单位。如果学术不行，对单位就难以施加压力。如果学术行，就应该不用怕用脚投票。用脚投票，是惩罚恶劣领导人的方法。多个优秀人才离开的单位，其领导将面临危机。同时，这也表明，在和平时代，人才只能是市场规律，以精神感召只能是对极少数人、极少数情况有效，对于多数人、多数情况，是不可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府必须通过完善中国科研土壤、环境、氛围，完善有关人才机制以及相关人才配套服务工作等来吸引人才。如果统计与我同时代的出国者极少回国的情况，就知道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不能依赖单方面的理想。

◆ 刺激内需

家电下乡不如藏富于民

美国麻省理工 (MIT) 斯隆商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

“家电下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从政府的目的来讲，肯定是为了刺激消费。但是“家电下乡”也好，购物券发放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政府的逻辑，那就是让大家少储蓄，多花钱。这基于政府的假设，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太高了。

在谈刺激消费政策的这两年，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经常听到中国的官员们和经济研究会大谈特谈“中国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每每此时，我都哭笑不得。如果这些刺激内需的政策方案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那么就会有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解决收入问题和解决储蓄率问题需要采取不同政策措施。现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建立社保体系、促销等等，我觉得无可非议。不管是现在经济碰到了问题，还是没有碰到的问题，早就应该建立社保体系。但现在在中国建立社保体系好像变成了刺激经济的方案之一，我觉得这又让人感到很可悲，事实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一个失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这么快，但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欠债”。

希望通过建立社保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如果是储蓄率过高，这么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如果中国的家庭即使能解决治病、养老等社保问题，但所拥有家庭储蓄还不够买房等基本开销，那么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促进依然还会是极其有限。所以，我觉得现在除了建立社保体系之外，首要考虑的是怎么来相对增加居民的收入，农民也好，普通市民也好，我觉得首先应该减少税率，降低税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太高了。

降低税率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应该同时采用：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发钱。发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过去税率过高的一个修正。政府把一部分钱返回给老百姓，也就是弥补过去的“欠债”。

第二，将来还应该把税率降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也应该降低。

比较起现在这种投资措施，把钱返还给老百姓更透明，更能减少腐败。比如说，政府宣布发给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多少钱，制定非常明确的公开的目标。如果我拿着身份证去领钱，领不到那些钱，我肯定知道这里头有腐败。

另外，我觉得最低收入标准可以大规模提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应该提高。有人担忧，说提高了最低保障标准和退休金，很可能提高的这部分会成为储蓄，没被用作消费，不能拉动GDP，他们因此认为，与其提高中国人的收入，还不如提高投资率、投资的速度。

但我就一直很反对这种崇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思维方式，而且现在中国产能大规模过剩，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提高的这部分收入都用作消费，主要的作用也是降低库存，对GDP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消费的是过去的库存，也是过去计算过的GDP，统计数字已经被计算过了。而从政治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保八”，而是保持稳定，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提高的那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还是被消费，没有必要过多介意，因为社会的稳定主要是跟收入增加挂钩，而不是跟消费挂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更多考虑藏富于民。

本刊说明

由于篇幅有限，部分文章进行了缩简。可能会有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另，斯当此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日益影响中国，中国日益改变世界，既是挑战，亦是机遇。中国在全球化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智之士提供客观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意见，欢迎发稿至邮箱 ccg@ccg.org.cn，谢谢。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编辑部